清宫萨满祭祀及其历史演变

姜 相 顺

满族萨满教神秘的面纱，使一些有关满族史学术专著、有关清代东北史的论述认为萨满祭祀仅是跳神、拿邪，未能将满族萨满野祭与空祭分开，致使以一面而代全体。他们用以概括的篇章，实在未能说明满族萨满教和清宫萨满祭祀的宏富内容。尽管萨满教的研究在国际上是热门之学，国内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 但清宫萨满祭祀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方始起步，资料的搜集也十分有限，许多问题若明若暗，极待进行开拓工作。本篇从清宫萨满祭祀及其历史演变的角度做一探求，希望能使满族萨满教的源流，清宫萨满祭祀的历史演变清晰一些，还望方家不吝教正。

一、清宫萨满祭祀的渊源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源远流长。清人认为堂子祭天起自辽沈，兹说不确。从满族的萨满祭祀来看，虽不能说与满族的源流一样古老，但亦不应相差太远。它经历了自然崇拜的萨满野祭到以天神、祖先宗崇为主的萨满氏族祭以至家祭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从宫迁萨满祭祀的角度来看，那么满族的先民靺鞨，女真都曾先后建立过渤海、金王朝的统治，其先民的宫廷萨满祭祀亦史有可稽。萨满教自公元七世纪进入由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王室后，十二世纪初进入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宫廷，十七世纪初又以其压倒一切宗教的雄厚势步入后金与清的满洲帝室龙廷，留下了宫廷萨满教的遗迹①。渤海国时萨满教 的信仰虽然早就存在，但其名称尚未出现。十二世纪初女真人建立金王朝时，正如南宋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所述，萨满“以其变通知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可见其在金王室中享有极大的权威和发挥着左右朝政的作用。

当然，满族先民的王朝统治，正如其先民的延续一样出现了历史的中断，因而其萨满教的历史也是不连贯的。但即使以满族先世能够连续考查的明代女真来看，也可以说清宫萨满祭祀是源远流长的。

从挖掘到的努尔哈赤族系家传秘录、珍贵的满族民间长篇英雄说部《两世罕王传》可以得知堂子祭祀的历史悠久；著名的扈伦四部之一的哈达部，其首领万罕在明廷扶持下强盛一时，曾经挟持女真各部。其母董尔吉妈妈八十寿庭，扈伦四部及建洲左右卫首领均曾率众趋拜哈达部的“侠倡唐舍”，为万罕之母祈寿祝福②。所谓“侠倡唐舍”，便是万罕统率哈达部的“堂子”。建洲左卫产领王杲曾借兵于东海窝稽部，其部酋引王杲先诣“堂涩”，后将女儿许嫁于王杲，方允借兵。“堂涩”即“堂子”。可见，女真族 双方结盟要先拜堂子，重以婚姻，方可成事。

二、努力哈尔赤时期的堂子祭

不谈自然崇拜的萨满野祭痕迹，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前，爱新觉罗氏族就有堂子。努力尔哈赤不服害死祖父之尼堪外兰，“同族宁古塔诸祖子孙至堂子立誓，亦欲害上以归尼堪外兰”

③1599年叶赫等九国进攻努尔哈赤，他率众“诣堂子”④祝告天神祖先拟发兵还击。

努尔哈赤攻占哈达、朱舍里、长白山、辉发、叶赫、董鄂、乌拉、斐攸等部时，兵马先废该部“堂色”，“掠祖像神牒于贝勒马前”⑤“堂色”即“堂子”。

可见，各部均有堂子，历史悠久，并不是努尔哈赤起兵以后才出现的。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是以武力攻占该部，首先废掉各部的堂子，以爱新觉罗氏的堂子取代之，它建在赫图阿拉老城努尔哈赤住所东南五里许。各部族世代崇祭的守护神祇和祖先神祇也统一于爱新觉罗氏堂子所崇祭的守护神祇和祖先神祇。努尔哈赤消灭敌对各部的堂子树立本部堂子的至高无上地位，毫不手软。但是，对自动投附效力的友好部族的堂子尚未采取取消否定的态度和政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皇太级崇德初年。爱新觉罗氏分别在辽阳新城即东京城和沈阳城东南建立了自已的堂子。

三、皇太极的萨满教改革

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年)一统称帝后，对所崇祭的萨满教做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历史面貌。皇太极严厉禁止萨满教野祭，下令“永不许与人家跳神拿邪，妄言祸福，蛊惑人心，若不遵者杀之”⑥。这一规定，使满族和清宫野祭衰落，而使向天神和祖先乞求福佑的堂子祭和家祭得到兴旺和延续。

他还以至高无上的皇权明确规定：“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⑦。这一规定结束了爱新觉罗氏之外的异姓满洲官民可以拥有本族堂子的历史，使各姓满洲只能以神匣代替堂子栖神，人神同舍，春秋祭祷，使满族家祭兴旺起来而成为满族萨满教之一大特征。这一规定，不但反映了满洲政治上的一统，而且也反映了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族家庭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取代了氏族部落经济的地位。

确立堂子祭的国祭地位。皇太极在崇德元年规定堂子圆殿元旦拜天制度：“每年元旦，皇帝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头礼⑧。可以看出，此时堂子首先是皇帝的萨满祭祀场所，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的满洲亲贵和来盛京的外族藩王都是跟随皇帝上香行礼参加祭祀的，从而使堂子祭成了国家的萨满祭祀。亲王多为爱新觉罗氏子弟，随皇帝祭堂子名正言顺。但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的官员有不少异姓满洲，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和皇帝统治下他们已不再有本氏族部落的堂子，礼拜爱新觉罗氏的堂子虽然名不正也只好顺从。外藩诸王(主要是蒙古贵族，多有姻亲关系）参加堂子祭则主要是表示政治的服属。

从“崇德六年定，每年元旦，亲王以下，贝勒以上遣护卫赴堂子挂纸，贝子以下不挂(今郡以上挂，贝勒以下皆停转)”，⑨来看，反映随着国家皇权的发展，堂子祭的祭祀规格在等级上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却可看出堂子祭的国祭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衰弱，爱新觉罗氏族祭的性质逐渐恢复。

皇太极在爱新觉罗氏权贵中推广家祭，禁止他姓祭堂子、树立皇家至上地位，必然极大地推动了满族萨满家祭的发展。崇德元年规定，凡春秋二季立杆致祭(即大祭)“亲王、郡王、贝勒，每家各祭三杆；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每家各祭二杆；镇国、辅国、奉国将军各祭一杆”⑩。所谓祭杆多少，当指在堂子和家中一月内进行萨满祭祀的次数，皇太极此令确实推广了家祭的频繁进行。看来此规定甚得皇室权贵们的拥护，而且在堂子和家中祭祀次数多少表示权势高低。他们显然以多贡牺牲、果品、饽饽、香、酒、纸钱献予神灵祖先为尊、为荣、为福、为寿。

所以虽然皇太极规定“不祭者听，其无爵宗室不祭”。但由于争祭者多有人在，仍不得不规定“其每月致祭日期：初一日，大内致祭。初二日以后，亲王、郡王、贝勒各以次轮一日致祭。各府应祭之日，若遇大内致祭，则应祭之家停祭。贝子、公等以次致祭”⑪。看来，崇德年间根据等级的制度规定了春秋大祭中当月每家贵族进行萨满祭祀所用的杆数即次数，及规定亲王、郡王等权贵与皇帝并列行祭的时间。同一爱新觉罗氏族内皇帝与权贵的祭祀不能同日进行，因此要排定时间，按官爵的高低依次祭祀。当臣下祭祀之日与皇帝祭祀冲突时，要停祭以保证爱新觉罗氏内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由于原始氏族社会军事民主主义制度遗规的影响，此时在清宫萨满祭祀中亲、郡王等(所谓入八分王公)仍保持着堂子单独祭神祭天的特权。

皇太极天聪、崇德年间爱新觉罗氏的权贵们进行萨满祭祀十分踊跃热烈，出现“争祀神”与“违例多祭”的现象，正是权势动荡变化的主、客观反映。为此，皇太极做了一些规定加以调整和限制：“凡祭三杆之家，于定期内各祭一杆。过十一日后，再各祭二杆。或致祭日，有两三家同祀祭神者，仍依次俟先祭之家祭毕，次祭之家方祭。如诸王贝勒于定期致祭之日有事不得祭，予期知会礼部，令次祭之家致祭。其有事者，随便补祭”。⑫可见，即使祭三杆之家，每次在堂子也仅祭一杆，由礼部这个国家机构协调祭祀次序。而且严格规定“凡为马群致祭者，亲王以下，辅国公以上许祭；镇国将军以下不许祭。有违例多祭并争祀神者，议处”⑬。这样，在爱新觉罗氏内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在堂子及家中，就轮番进行着萨满祭祀，成为宫廷显贵们喜庆福寿、繁荣的宗教活动。清宫皇室显贵们的萨满祭祀活动轮番在各家及堂子进行，清宁宫也不是专门的神堂，只在一定时间进行萨满祭祀。这种状况，当然会对官员百姓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状况，不久当即发生变化：不论皇室，还是亲王、郡王、贝勒等在堂子、在家院均立一杆，春秋大祭中祭祀一次。没有权力在堂子占一席地的满洲官民人等，在家院中均可立一杆以祭。百姓不能说“祭天”，可称“外祭”，⑭后来有清一代(乾隆以降)的状况表明，皇室权贵在家院在堂子均各立一杆，不过在堂子皇帝主祭，亲王等权贵陪祭，而在家中各自进行萨满祭祀。

堂子月祭，皇太极在崇德六年亦做了规定：“每月初一日，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派一人斋戒一日，诣堂子供献”⑮。堂子月祭的每月初一日皇帝是主祭，亲王、贝子等权贵处于陪祭供献的地位。陪祭贡献也是一种权势的表现。

堂子佛诞，在崇德六年的盛京已经实行。皇太极规定：“每年四月初八日，大内并每旗王贝勒一人，依次往堂子备供。是日，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报祭、不宰牲、不理刑名”⑯，以便在政治上拉拢蒙、藏权贵归附。这是清太宗皇太极在萨满祭祀中的重大改革举措。

堂子祭马神，原有规定：“每年春秋二季，为马祀神。每季用高二尺四寸大猪八口。每次堂子致祭，用马十匹。祭毕，用绿色绸条拴记马鬃尾。其青红绸条，拴记备祭马匹⑰。这说明在盛京时期，清宫萨满为马祀神也分两处，一处在堂子亭式殿，用马仅十匹；另一处当在清宁宫祭马神，献牲用大猪八口，且规定猪的尺寸，当为正、次两天的朝、夕祭各用两猪之数量。从中可见清初对用以定天下的“满洲长技”弓马的重视，皇太极时期已成定制：每年春秋二季为马祀神。

此外，对堂子祭的神杆等项和赴堂子挂纸钱的权贵等级也作了细致的规定和要求。崇德六年规定“每年春秋，立杆致祭于堂子，用松树一株(谨按：向例留树梢枝叶十有三层，今留枝叶九层，余皆芟去枝叶制成，杆长二丈)，楠木幡头、黄绢幡一首，五色缕各九尺(剪为缕)，

三色朝鲜贡八纸十张(制为钱)黄棉线三斤八两，及染纸用紫花、槐子、白礬。均交各该处办进⑱，从所用物料来看，皇太极时期的堂子大祭祭神杆的设施和物品，与乾隆时期堂子大祭祭神杆大致相同。松树的神杆上当时留枝叶十三层，当反映了崇德年间满族对天有多少层的看法。满族民间萨满神帽上停有一、三、七、九、十三个乌，当为对天层数看法的旁证⑲。满族萨满传人付英仁讲天有17层，地有9层，共26层⑳，恰为13层的二倍。可见，十三层的看法有根据。当然，至嘉庆年间时，由于满族入关后长期受汉族“九天”说的影响，早已发生改变，留枝叶九层就是改变的证据。

能在堂子挂纸钱，亦表明其爱新觉罗氏权贵的地位身份。“崇德六年定：每年元旦，亲王以下，贝勒以上赴堂子挂纸钱，贝子以下不挂(今郡王以上挂纸钱，贝勒以下不挂)”㉒。反映了从崇德年间到雍正年间爱新觉罗氏权贵供献上天神灵而求福禄权力的等级变化，并不是所有宗室觉罗能够享有的。

皇太极时期，国家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均拜祭堂子，包括亲征、凯旋、命将等，可以看作是对努尔哈赤时期有军国大事祭堂子的继承：崇德元年，皇太极亲征朝鲜，至出发日即先率文武大臣等恭诣堂子行三跪九拜礼，在堂子外立八旗大纛致祭行礼，以求吉利获胜才率军出发。

崇德二年，皇太极获胜班师回至盛京，先至堂子行礼，以谢天神护佑。

崇德三年，皇太极派王贝勒等为大将军出征，亲率王贝勒至堂子行三跪九拜礼以告天神并乞福佑，并在堂子外立八旗大纛行一跪三拜礼乞天福佑㉓。

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中，如天聪九年多尔衮获历代传国玺，崇德元年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等征明凯旋，皇帝亲自迎接，设黄案或设八纛率众拜天，不一定非在堂子不可。

皇太极对萨满祭祀的一系列改革仿佛都集中于堂子祭，这是由于堂子当时较多涉及军国大事而有记载的缘故。实际上清宁宫的建筑，内部神位的设置、供器供品的摆放制作，萨满祭神祭天的种类、程序、祷词、歌舞都是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奠定模式的。

四、清入关后顺治年间的宫廷萨满祭祀

清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进占北京，西征南伐，逐步统一了全中国。这样巨大的历史变动，清宫萨满祭祀仍然转移保存下来。清定都北京后，仿盛京城外东南的堂子结构在紫禁成东南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建堂子并仿盛京清宁宫改建坤宁宫。这一工程，当在顺治二年完成。因为顺治二年，关于清宁宫萨满祭祀有了一系列清统治者发布的规定并要求执行。从这一系列规定中，可以看到顺治初年在北京清宫萨满祭祀的概貌和变化。

北京堂子有祭神殿(即飨殿)五间，向南(神位在北)，殿上覆琉璃瓦(此当与盛京宫室顶黄瓦绿剪边不同)。其南为拜天圆殿(又称亭式殿)，有八面刻有花格的窗门，向北(神位在南)。东南有上神殿(又称尚锡神亭，构造同亭式殿，规模缩小)三间，向南(神位在北)，有墙两层，外墙门北开，内墙门南开。整个堂子内墙一道，门三间，向西开。内门外西南有祭神房三间，向北；内门外西北为街门三，以红色木栅为之。堂子外墙一道。在拜天圆殿南正中设皇帝致祭神杆石座，次稍后两翼各分设诸皇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致祭神杆石座，依次序列，均向北。

坤宁宫依盛京清宁宫的满族居住风俗改建后，其东二间为皇帝大婚洞房，东三间为过

道，中四间成为专门的神堂、神厨，西二间为神器库，西一间为过道，共九间。坤宁宫除皇帝大婚洞房暂住三日外，成为清宫萨满祭祀经常进行的固定场所。

为显示皇家气魄，也为雅致清洁，在神武门内西旁设祭马神室五间，正日为皇帝所乘马，次日为皇帝牧群繁息，以萨满主持祭祀神灵而求福佑㉔。祭马神室的祭祀与堂子圆殿祭马神同日进行，还要“请坤宁宫朝祭、夕祭神”，“皇帝不亲诣行礼”㉕。

由上可见，清入关后的顺治年间，清宫萨满祭祀在北京紫禁城内外仿盛京规制基本确立下来，但并不完全相同。有些礼仪较入关前也有所变化。命将出师在清入关前一般要到堂子行礼拜纛，入关后的顺冶初年却不是这样：“顺治元年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征流寇（农民起义军），赐敕印。是日，设大驾卤簿于午门外。设御座，张黄幄于皇极门（后为太和门）丹陛上，以所颁敕印陈设檐下东旁黄案上，王以下文武各官咸盛服会集。候圣驾出，众咸跪。世祖章皇帝御门升座，诸王各官立丹墀。赞鸣鞭，阶下三鸣鞭。鸣赞官赞排班进跪，大将军率出征官兵皆进诣拜位跪。内院大臣奉满洲、蒙古、汉军三体敕书，次第宣毕，奉敕印授大将军。鸣赞官赞叩头，王及出征各官行三跪九叩礼。赞退，王及各官皆退。即起程前行。”当时大概北京堂子尚未建成，所以拜堂子的礼仪未能举行。但至顺治十三年命将出师，仍无拜堂子的礼仪，说明入关后礼拜堂子特别在军事礼仪上较之入关前已不那么频繁。

这一点，也表现在“顺治元年定，每年元旦皇帝诣堂子行礼或不行礼，由礼部予期题请”的规定之中，每年元旦皇帝诣堂子行不行礼由礼部予期题请，皇帝再表示可否，可以看出其不固定性。在聚临传统封建礼仪海洋的包围下，清统治者固有的民族礼仪的动摇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每年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致祭拜天行礼，其礼仪的庙堂化典制化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顺治二年定：亲王以下、贝勒以上，外藩来朝亲王以下、贝勒以上俱赴太和门齐集。卤簿大驾、乐器陈设如常仪。（皇帝一引加）乘舆出，王等在午门金水桥分翼排跪，候驾过，随行。贝子以下、镇国将军以上、民公、侯、伯、都统、精奇尼哈番、满、汉尚书、汉武官一品以上等官及外藩来朝贝子以下，都统以上，俱在东长安门齐集，候驾出，跪，侯过，随行。皇帝致祭行礼，王以下各官随行礼。毕，皇帝还宫。其不随往文武各官俱朝服，在午门外齐集，候驾往还时，俱排跪送迎。”㉖

可以看出，皇帝每年元旦如果去堂子致祭行礼，已是举朝的大事，同年还规定：

“每年元旦，躬率王公群臣展拜于堂子，礼成回銮。王、贝勒、贝子等诣乾清门恭候，皇帝率王、贝勒、贝子于宫中祭神殿行礼。由礼部予期请旨。“㉗其宫中祭神殿即改建后的坤宁宫神堂，从参加人员看纯粹是皇帝的家祭。但皇帝批准王、贝勒、贝子等参加时，显然就具有爱新觉罗氏族祭的性质了。

顺治初年，清统治者在完成坤宁宫改建和在北京启建堂子后对清宫萨满祭祀做了全面的安排，其中包括如下各项：

明确规定清宫萨满祭祀堂子立杆大祭时间和礼仪：“顺治二年定，每年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俱立竿，皇帝亲诣致祭。”㉘堂子立杆大祭与入关前的盛京时相较，更加排场气魄：“祭日卤簿大驾全设。内掌仪司官设皇帝行礼坐褥于堂子正殿（引加又称飨殿）内一，前圆殿（引加又称亭式殿）一。皇帝具礼服乘辇出，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在午门内金水桥两翼排跪，候驾过，随行。未入八分公以下及文武官员俱在午门外排班跪送。皇帝降辇，入至殿中，向东坐于

所设褥上。王、贝勒等在丹陛上坐。贝子、入八分公等在丹墀内坐。皇帝于正殿及圆殿两处行一跪三叩头礼。诸王大臣俱排立，不随行礼(引按：没有资格行礼)。祭毕，皇帝在丹陛上西旁(引按：满族以西为贵)正坐，公等以上亦在丹陛上分翼排坐，进福胙、饮福酒。毕，皇帝升辇，作乐还宫。午门外齐集各官排班跪迎。王、贝勒、贝子、入八分公以上随至太和门，候皇帝还宫，俱退。"㉙礼仪进行时，堂子"甬道铺棱荐，两殿内均铺五彩花席、花红毡"㉚较之入关前的盛京堂子更为富丽堂皇。此外，还规定"春秋致祭，赞祀(引按：指萨满)所用朝衣及请神位至堂子所用黄舆、御仗、衣帽，均于各该处领取"㉛

堂子尚锡神亭月祭当为崇德元年以前之例，清入关后顺治年间相尚未改：

"每月初一日，于堂子内东南隅尚锡神亭祭祀，设时食一盘，醴酒一琖于案上，司香上香，司俎满洲挂净纸于高案下所立杉柱上。诸王护卫等各以次挂净纸。满洲管领一人免冠、脱褂、解带入，跪叩祝毕，出。司俎入，将所陈酒注案前所设碗内，撤所供时食，分给管领。"㉜

堂子浴佛为入关前崇德元年正式确定，清入关后的顺治年间沿用下来，但其进行已经庙堂化，成为朝廷的重大活动，充分反映了萨满教与喇嘛教的交融：

"顺治二年定，浴佛日赞祀(引按：又称司祝，萨满)所用朝衣及请佛至堂子用黄舆、御仗、衣帽，于各处领取，与春秋致祭同"㉝。

堂子守卫员役规制："顺治二年定守卫堂子员役，设七品官二人，八品官二人(今八品官六人，共八人，分八旗选补)，由礼部选补"㉞。顺治初年，看守堂子员役"由礼部选补"，反映了堂子国祭性质很重的情况。堂子设品官专门负责，则反映了清宫萨满祭祀规制的加强。而嘉庆年间堂子看守员役"八旗选补"的原则，则反映了堂子祭原是满族固有的萨满祭祀，在皇权相对稳固强大的情况下已能尊重民族固有宗教信仰的变化。

此外，堂子月祭，为马祭神于堂子等入关前的清宫萨满祭祀堂子旧制，在顺治年间基本沿袭下来。

坤宁宫祭神之制，顺治初年虽没有明确规定，但沿袭盛京清宁宫旧制则十分明显："西大炕供朝祭神位，北炕供夕祭神位，廷立神杆以祭天"㉟。

坤宁宫元旦行礼，顺治初年当沿袭入关前旧制；正月初一日三更，上香后皇帝、皇后在神位前行礼。而皇帝率王、贝勒、贝子等行礼，则并不是经常进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坤宁宫日祭，顺治初年对每日朝、夕祭的时间，用牲数、供糕、果数做了明确的规定：

"顺治初年定：大内每日祭神二次，晨以丑寅时，晚以未申时。均用猪二。月朔皆陈时果九碟。余日陈糕十盘"㊱

日祭当然要经常进行，反映了入关前后清宫萨满祭祀的重大变化。处于全国抗清力量激烈反抗中的满族统治阶级显然比在盛京时期更为经常地进行萨满祭祀，乞求神灵的护佑。清入关前的盛京清宁宫区既是皇帝、后妃的寝宫，又是皇帝后妃休息、玩乐、宴饮和议政、接见外藩亲王的处所，不可能经常进行萨满祭礼，这是常识可以理解的。而坤宁宫在清入关后经仿清宁宫改造已成为专门进行萨满祭祀的神堂，经堂以至每日进行萨满祭祀是允许可能的了。因此，除了"恭遇祭坛、庙、皇帝斋戒及忌辰、清明等不宰牲之日，并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请神送堂子后"㊲，均可进行坤宁宫萨满祭祀。

频繁进行清宫萨满祭祀，其牺牲的宰杀，糕酒和物件的制作，祭猪、薪炭、祭品、器皿、果品和安春香(一称七里香，又有叫鞑子香的)的采办，都要求有大量人手明确分工，落实职责，以保证清宫萨满祭祀的正常进行。顺治初年，即明确规定："一应造办，均由祭神殿司俎官率

各执事，首领太监率太监，司香妇长率司香妇，掌爨妇、碓房妇祗承其事。其祭猪粢盛薪炭及造办祭品，一应器皿，均由掌仪司照司俎官呈报移文该处，敬谨采取”㊳。

同时根据清宫萨满祭祀的实际情况，对坤宁宫祭神员役的来源、人数也做了明确规定：“顺治元年定，祭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笈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二人（即司祝）、赞祀女官十人（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入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㊴。其中，赞祀女官长与赞祀女官均为萨满太太，必须在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对神职人员的衣帽和请神器具供给来源处所亦作规定，“春秋致祭赞祀所用朝衣及请神位至堂子所用的黄舆、御仗、衣帽，均于各该处领取”㊵，以使清宫萨满神祭天的活动顺利进行。

坤宁宫四季献神在顺治初年确定了时间、献神品种、数量，要求预先备办，指出备牲的方式：“每岁四孟月，以牛二、马二、金十两，银百两、币十、布四十敬献于神。予期具奏，交各该处备办。及敬献毕，交会计司计直备猪（今改交牺牲所），以供祭祀”。㊶

此仪中，敬献物品中除银外交会计司变卖购猪，保存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从中可以看出商品交换在萨满信仰中的印记。

嘉庆时期，将四季献神除银以外变卖购猪古俗亦未加变化，仅将交会计司出售改为交牺牲所进行。到乾隆光绪年间，四季献神的物品为白马二、牛二、金、银各二锭，蟒缎、龙缎、庁金倭缎、闪缎及各色缎十、毛青布四十，与顺治年间相较仅少了币十，亦可算微小变化。

此外，坤宁宫月祭、坤宁宫月祭翌日祭天、坤宁宫报祭、坤宁宫大祭、坤宁宫背灯祭献鲜均仿入关前盛京清宁宫之制按时进行，当然前者在细节上较入关前是更加富丽堂皇了。

总而言之，顺治年间一系列规定使清宫萨满祭祀在北京固定下来并付诸全面施行，以求福佑。情况的剧烈变化，使清宫萨满祭祀在清入关后有了一系列的显著特点：其一，即经常化，坤宁宫日祭的出现，在清入关前的盛京清宁宫是不可能的，但在入关后清宫萨满祭祀具备了频繁进行的条件，并且从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来看，民族矛盾的激烈和频繁，使居于征服地位的爱新觉罗氏有了迫切的现实需要，向古老民族神灵乞求福佑和慰籍。其二，即庙堂化、典制化，各种类型的萨满祭祀和祭祀程序完全与皇家礼仪相交染，古老的萨满祭祀习俗显得隆重庄严和繁琐，且以典制确定下来。其三，清宫萨满祭祀神职人员的职官化，他们不但是专门的神职人员，而且在朝廷中有官位和俸禄银饷。其四，太监参与清宫萨满祭祀。在清入关前太监人数少而且制度不健全，史籍中亦无明确参与的记载。清入关后，皇室因袭了前朝的太监集团，清宫萨满祭祀中有大量太监服务于神职，不但参与在坤宁宫祭神祭天，而且在堂子也有他们的职司。本来按照历朝规定，太监是不可参与国家大典、特别是祭天地山种、社稷、祭神灵活动的。这些特点，终清之世，绝少变化。

清代康、雍时期国内战乱，朝廷党争连绵不绝，政局不稳，清宫萨满祭祀仅作各种局部调正，其重大变化是康熙十二年后汉官不随祭堂子。乾、嘉时期，全国政局趋于基本稳定，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在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下，清统治者将在顺治年间固定并全面施行的清宫萨满祭祀进一步加以完善、提高，对整个满族的家祭发生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乾隆十二年开始，弘历即命人着手全面整饬清宫萨满祭祀，并对王公官员人等家祭神谕神词进行集、诠释、整理。乾隆十七年下令将“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㊷。经三十年

的努力，清廷完成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一书，对清宫萨满祭祀和满族家祭的延续起了重要的作用。清代中期，宫廷萨满祭祀在紫禁城内外连续不断地神秘进行，使满族慎终追远以乞福佑康健的家祭延袭不衰，从而成为他们维系家庭精神、伦理、道德、文化、娱乐的重要活动，对团结满族民族，崇尚武功、神灵，巩固封建统治起着重大的历史作用。

清宫萨满祭祀各种类型的仪节、陈设的局部调整完善在康雍乾嘉时期较为频繁。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分类论述。简言之，清入关后在北京所建堂子，据载在“庚子以后，改立于东安门外之南”，为清季建外国使馆区不便行祭而改建。现已不存在。至清亡后，北洋军阀当政时期，溥仪仍居紫禁城。此时清宫萨满祭祀用猪减少，朝、夕祭一般均用一猪，以至省牲红漆包锡大案也仅剩下一具㊸。

---

①参见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253页，198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②⑤参见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134页，1990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⑥《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

⑦⑨⑩⑪⑫⑬⑰⑱㉓㉔㉞㊵㊷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九十二。

⑧⑮⑯㉒㉖㉘㉙雍正《大清会典》卷九十二。

⑪参见姜相顺、佟悦、王俊：《辽滨塔满族家祭》76页，1991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⑲富育光等：《满族萨满教研究》152页，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⑳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页，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㉑赤松智诚：《朝鲜巫术の研究》。

㉕㉝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八十二。

㉗㉚㉛㉜同上，卷一千一百八十一。

㉟㊱㊴㊶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九十四。

㊲㊳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八十三。

㊸参见朱家溍：《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故宫博物院院刊》总二期。